



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陈建奇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3月26日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强调加强全球合作及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习近平主席参加G20视频峰会并倡导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开放合作是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有效应对疫情全球性扩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必须强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促使世界各国携手解决潜在挑战，保障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既是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也符合全球化大势所趋。

强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势在必行

疫情全球性扩散的影响堪比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前景担忧。IMF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在4月14日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3%，衰退程度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疫情全球性扩散已经引发金融资本市场大幅波动，美国股市多次熔断，欧洲及亚洲等主要地区股指都出现了较大幅度调整。虽然股市等金融市场的波动原因十分复杂，但疫情全球性扩散显然构成了投资者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防控疫情所采取的关闭边境及限制人员流动等举措已经对国际贸易投资产生冲击，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难以独善其身，采取强有力的跨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日益迫切。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不仅存在现实的诉求，更有实践经验的支撑。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世界主要国家通过G20领导人峰会倡导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当时双边及多边协调极为频繁，全球携手一致共渡难关。全球经济仅仅在2009年衰退一年，而后在2010年便出现快速反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较快走出低谷的重要经验。当然，如果没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世界经济能否自我快速修复？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得到回答。大萧条期间世

界主要国家各自为政，实施货币贬值以获取竞争优势，采取严格资本管制避免资本流出，实施加征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结果是国际贸易投资大幅减速，世界主要国家及全球经济经历了四年多的持续衰退。上述事实突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当前针对疫情的巨大冲击，通过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已经明确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即承诺竭尽所能，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恢复全球增长，维持市场稳定并增强经济韧性。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支持经济，保护劳动者、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以及受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并通过适当的社会保护措施来保护脆弱群体。继续采取有力、大规模的财政支持措施。支持各国央行根据授权采取特别措施，增强金融稳定，以及加强全球市场流动性。习近平主席在参加G20视频峰会时强调，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进各国货币汇率基本稳定。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作为历次危机的应对经验启示，已经成为当前应对疫情全球性扩散的重要举措。

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临的新挑战

强调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疫情影响，成为包括G20成员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协调特别是推动G20峰会提出的政策举措尽快落实。然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与国际形势有关，而且与各国的政策空间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为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供重要的经验，但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的经济社会挑战不同，疫情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此背景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理性分析当前与金融危机的形势有什么不同，厘清潜在的挑战，由此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重点，实现更加

高效的国际协调。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环境来看，疫情全球性扩散与金融危机存在显著的差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这次危机与大萧条截然不同，1930年代的大萧条源于人类问题，源于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冲击，而这次则更像重大的暴风雪或自然灾害。和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当前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在金融危机中，是银行体系的问题感染整个经济，而这次是疫情全球性扩散对经济的冲击影响了银行体系。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世界各国开放合作不断深化，全球化置于国际协调的主流方向，但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较为突出，逆全球化的现象备受关注，如何营造深化世界各国携手合作的良好环境，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以回避的挑战。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空间来看，财政债务高位运行促使世界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空间大幅缩窄。在经济社会受到疫情等意外冲击时，世界各国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协调，通过财政政策工具针对特定领域精准施策，以此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目的。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债务水平不高，但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债务负担大多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美国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已经由2008年的62.6%上升到2019年105.5%，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也均达到甚至超过100%，财政债务高位运行促使世界各国应对世界经济风险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空间显著缩窄。

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诉求来看，世界各国分化引发国际协调较难就具体政策达成共识。各国经济社会差异巨大，促使宏观政策侧重点不同，各国对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诉求就不同。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虽然认识到国际协调的重要性，但对于G20峰会等治理机制达成的共识，则面临着如何落实、什么时候落实等挑战。

强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点

尽管当前形势与金融危机不同，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临着新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难以进行协调，近期G20峰会的

召开及声明的发布预示世界各国不仅有进行国际协调的要求，也有亟待合作的诸多领域。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本质上是为了保障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抓住维护世界经济稳定运行的主题，抓重点、抓难点，既要防范疫情全球性扩散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又要推动建设国际协调的治理机制，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常态化沟通协调。

一方面，推动多层面国际经济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疫情全球性加速扩散具有复杂性，对世界经济金融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冲击，部分金融资本市场已经出现暴涨暴跌的现象，金融系统性风险引发世界高度关注，世界主要国家央行通过货币互换等手段维护货币金融稳定，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运用各种工具促进跨境资本有序流动，避免汇率市场等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此外，伴随世界经济减速及宏观下行压力加大，有些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主权债务风险突出，不排除部分国家或者地区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对此，需推动加强区域或者全球稳定基金的建立和完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底线。

另一方面，推动G20等治理平台构建应对疫情的常态化协调机制，促进世界主要国家对宏观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密切沟通协调。疫情对世界各国影响不同，发生疫情的国家所处的疫情阶段也存在差异，必须有针对性地根据形势变化明确不同阶段的各国政策重点。考虑到疫情形势随时在变化，各国所面临的问题也会出现动态改变，通过在G20等治理平台下构建应对疫情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问题进行及时沟通，避免政策出现对冲或者形成对抗，推动各国在汇率、关税、贸易壁垒及资本管制等方面保持良好的合作环境，尤其是促进世界各国推动产业链合作，为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构建良好的体制机制，提振世界经济复苏士气。



气好转。四是重视运用信息技术保障监督。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在拓宽和畅通监督渠道、迅速梳理信息及时发现问题线索、科学研判政治生态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规则》明确了依规依法建设检举举报平台的新方向。尤其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时期，依法有效使用检举举报平台能够快速捕捉违纪违法风险和漏洞，解决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提升监督效能，更好服务群众。也要看到，我国不同地方巨大的生产生活的差异，加剧了信息技术使用的不确定性。为此，完善传统控告检举方式和新技术条件下的控告检举体制机制的衔接，防范和避免技术门槛、组织条件的偏差引致的党员群众监督失位或者失范，这是我们强化监督必须关注的基础命题。

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和国家监督的重要思想转化成科学制度和治理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踏上现代化的快车道，制度执行环境进一步优化，制度权威有效确立；另一方面，使正风肃纪反腐既依靠人民也动员人民，既彰显党的核心价值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对党的认同与信赖进一步深化。这种认同的制度化增强了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信念与能力。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教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成立，57国共同筹建的多边开发银行。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2016年1月正式运营，旨在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开业4年多来，亚投行秉持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原则，积极稳妥拓展各项业务，已累计批准项目70个，总投资额达137.7亿美元，投资覆盖了交通、能源、电信、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成员国发展到102个，遍布世界各大洲。亚投行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树立了专业、高效、廉洁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提出的倡议，得到了沿线各国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倡议提出以来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是由中国发起，在推动各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目标一致。亚投行成立以来，始终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5月，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6家多边开发银行，与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一带一路”构建稳定、多元、可持续的融资机制。近几年来，亚投行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发挥资金支持、金融帮扶作用，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带来了切实福祉。

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亚投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为重点，不断加大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在银行成立的头一年，就为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缅甸、阿曼、阿塞拜疆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9个项目提供了17.3亿美元贷款，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125亿美元，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产生重要推动作用。2016年，亚投行投资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项目，该项目建设已顺利完成，成为巴基斯坦南北交通运输走廊组成部分，对改善巴基斯坦交通基础设施、促进贸易和物流、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土耳其是“一带一路”参与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国内的天然气使用者逐年以百万计增长，能源领域面临着不断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2018年，亚投行投资了土耳其天然气贮藏设施建设项目；2019年，投资了土耳其地热发电站建设项目。两次投资共计7亿美元。亚投行通过帮助土耳其加强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其国内能源需求得到了满足，进而推动了经济发展。随着这样高质量的投资愈来愈多，亚投行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对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不断提升。

促进沿线国家的市场联系。“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亚投行积极发挥金融支撑作用，通过投资有效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深化国际交流。2016年，亚投行投资了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道路提升项目，共计2750万美元。由于该边境道路是泛亚洲公路网的一部分，因此该项目成功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市场合作，助力了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扩大和加强了沿线国家地区的市场联系。2018至2019年间，亚投行投资老挝13号国道的建设项目，共计约4100万美元，道路建设由中国湖北交投建设集团中标实施。该投资项目不仅将改善沿线居民的生活、就业和公共服务条件，促进老挝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与老挝之间技术、人才、资金、材料的流通，加强国家间的深度合作。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迅速推进，沿线国家对金融合作有着更加广阔的需求。亚投行通过投资多种基金与债券组合，促进了沿线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联系。仅在2019年，亚投行先后于7月向亚洲投资基金投资7500万美元，8月向亚洲气候债券组合投资5亿美元，11月向亚洲能源转型基金投资1亿美元，12月向中信

□ 熊北辰

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

资本泛欧亚基金投资1.25亿美元。以上投资的这些基金、债券组合，均涉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成为联系各沿线区域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的有效对接。

推动沿线国家产业转型升级。能源领域是亚投行重点投资的行业领域。亚投行秉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原则，聚焦清洁能源投资领域，助推沿线国家产业从高能耗高污染，向低能耗低污染的转型升级。2019年12月，亚投行向中国京津冀低碳能源使用及空气质量提升项目投资5亿美元。该项目有助于提升京津冀地区液化天然气的制造、贮藏、使用技术，推动相关产业从使用煤炭到使用天然气的转型，有效减少碳排放量，实现产业升级。2019年12月，亚投行向尼泊尔能源分配系统的升级扩张项目共投资约1.12亿美元，该项目将助力实现21个遍布于尼泊尔各地的电力供给升级计划，有利于提升电力相关产业的效率。亚投行还积极发挥金融引导作用，让沿线的发展中国家共享中国发展成果。

助力沿线国家抗击疫情。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严峻考验。亚投行迅速开展了一系列救助、帮扶举措。联合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制定多项投资救助计划，其中包括：对中国投资3.55亿美元，帮助渡过疫情难关；对土耳其投资5亿美元，帮助缓解其因疫情而发生的资金短缺问题；对印度尼西亚投资2.5亿美元，帮助其加强医疗、医护人员，提升病毒测试、应对条件。这些投资救助行动，既有效帮助了沿线国家克服疫情困难、尽快回到正常经济发展的轨道，又加深了国际合作交流与情谊，增强了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抗击疫情的信心。



（上接1版）检举控告作为人民群众和党员监督公权力、维护党的纪律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其规范运行有助于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法治意识和程序意识，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的制度环境。《规则》的制定施行是针对合署办公后纪法衔接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规则》有效衔接了监督执纪规则和监督执法规定，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形成了对人民群众监督领导干部和公权力主体较为完整的体系，深化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依规依纪依法管党治党的政治逻辑和实践逻辑。

在权威运行中巩固和拓展监督效能

检举控告权是确保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的重要监督力量，也是净化政治生态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制度安排。《规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的重要党内法规，有很高的位阶和权威性。《规则》将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处理检举控告全过程，深刻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根本要求，突出了纪检监察机关行使权力慎之又慎、自我约束严之又严的一贯要求，彰显了我们党加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核心价值和实践要求。一是更好维护人民当家作主权利。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长期执政使

我们党拥有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也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严重危险。《规则》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拓宽了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渠道，强调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来保障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权利，强化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利和能力。加强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既是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政治需要，也提出了我们党以完善制度防止权力运行偏离党的宗旨、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实践要求，同时确立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的政治逻辑。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是同向发力的监督过程，群众监督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群众监督权利的有效落实，既是对党员干部和其他公权力行使人员工作生活的有力约束和规范，也是对党群关系的积极维护，使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党员干部慎权慎独慎微也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是深化拓展了权力监督的效能。各级纪委监委担负着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履行职责、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基本职责。《规则》通过规范和细化检举控告权限和程序，严格规范纪检监察机关权力，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保障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一方面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自我监督，自觉接受外部监督，高质量推进纪检监察工作，保障党的专责监督利剑永不蒙尘。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民群众有效监督的途径，更好保

障检举控告人的监督权利。其间，《规则》关于检举控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予以表扬和奖励的规定，构成了党员群众制度化监督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统一，有助于改善监督环境，提升监督能力和监督权威。

三是在规范监督中净化社会风气。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更好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更好激励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的忠诚干净担当造福人民。《规则》凸显了以铁的纪律保障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价值要求，并以制度形式规范包括监督权在内的所有公权力运行，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肆意破坏。健全检举控告体制机制旨在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也是一些人基于私利而进行的诬告陷害，极大消耗了党的监督资源，并造成制度执行失焦失准，助长了不正之风，也严重挫伤了一些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此，《规则》一方面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检举控告工作中，应当强化宗旨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不得漠视群众疾苦、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另一方面，鼓励实名检举控告并形成规范完善的处置和保护机制，同时以章程形式对诬告陷害行为做出明确惩戒规定。这一旨向清晰的制度安排就是要旗帜鲜明强化惩戒与激励机制，既高压惩治腐败，又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鼓励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本质是要坚持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培育社会理性，实现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和社会风